

试析民国自然灾害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张堂会

【提要】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对作家的创作心态与创作风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自然灾害的影响下，作家把眼光更多地投诸于农村，使得乡土文学异常发达，而都市文学则相对较弱，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严重失衡。而左翼乡土文学的发达反过来又促进了农村的觉醒与反抗，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现代文学 自然灾害 灾害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5-0111-06

自然灾害与人类的生息行止相伴而行，灾害最早的文字记录可以追溯到殷墟甲骨卜辞，通过词源学的考察可以发现水或火是“灾”字、“害”字的本源^①。从今天还习用的“水深火热”、“水火无情”等熟语可见一斑。中华民族是在与自然灾害的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历史。自然灾害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远古的“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神话就和洪水、干旱灾害有关，历代文人对水、旱、蝗、疫等灾害及其对百姓造成的伤害都给予了深切的关注与同情，中国文学关于自然灾害的书写一直不绝如缕。

民国时期水、旱等自然灾害频仍，现代文学从各个方面真实形象地刻画出了哀鸿遍野、饿殍塞途的社会现实，对自然灾害下的经济与民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方面的关系作了详实的考察与思考，敢于正视阴暗的人性与淋漓的鲜血，表现了作家直面苦难的勇气和良知。

自然灾害和作家的人生轨迹密切交织，深深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心态，其创作风格打上了浓重的灾害烙印。自然灾害密切了现代文学与乡土的联系，使得现代文学从张扬个性主义转向集体主义描写。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也因灾害为之一变，现代文学始终高唱着乡土文学的主旋律，都市文学风景线只是时隐时现地漂浮在乡村的烟霭里。

一、现代作家对自然灾害的文学应对

古人常云“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愤怒出诗人”，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许多作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09CZW050)的成果之一。

^① 彭邦炯：《甲骨文“灾”非灾辨——兼论商人的灾祸观》，《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家的人生轨迹都与灾害、灾荒相交织，饥饿与苦难成了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积淀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文学应对。

沙汀的创作与四川的自然灾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重返遭受灾荒的故园之旅才使他寻回了那片乡土，写出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地道的四川故事，找到了自己文学的落脚点。1936年，沙汀从上海返回故乡去奔丧，给母亲办了一场体面的丧事。在家赋闲的日子里，他开始近距离地去观察与思考故乡与社会，同时有机会漫游故乡。有一天，舅舅郑慕周家里来了两个客人，他们是四川赈会派下来调查北川灾情的官员，准备让舅舅关照一下。沙汀闲着没事，就和这两个人一起去北川看看。他们来到了北川县城，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只有二十多户穷得揭不开锅的人家。沙汀住在邮政局的一座破院子里，曾和省里来的人一起去近郊的山区查灾。他在街上经常能碰上流浪的儿童，在墙角边看见老人倒毙的尸体，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老太婆半裸着身子僵卧在地上，身上的衣服已经被人给扒开了。那些饿倒在河滩上的人，还没断气就有鸟雀来啄食。邮政局长夫妇是一对从异地迁来北川的忧郁的知识分子，良心还未泯灭，对大灾之后的社会现实感到震惊，对县长和联保主任这些在灾荒中还肆意搜刮群众的官老爷们感到失望和无奈，陷入了一种深深的精神苦闷之中。这些观感和印象成就了他的小说《苦难》，作品生动形象地塑造了大灾之后陷入茫然、孤寂之中的邮政局长的形象，对灾民的苦难生活也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特别是那个老太婆的尸体在作者构思时又晃动在眼前，那荒凉破败的北川县城也化为《苦难》中这样的景物描写：“市街是破烂而可怜，原来的屋脊只剩有一片燃烧过的发赤的瓦砾，断墙和破灶，比沙漠还荒凉。”

经过这次家乡之行，沙汀耳闻目睹了那些以搜刮灾民为天职的下层统治者的骄横无耻，对灾荒下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准确的认识，给其文学创作带来了变化的契机，促使其创作彻底地转向自己的乡土。回到上海后，他连续

写了好多暴露灾区生活的小说。如1936年7月份写的《灾区一宿》，反映了自己和省调查人员去郊区山村查灾的情况，刻画了一个忘恩负义而又凶狠无耻的山沟地主贺么夹夹的形象。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就来源于这次北川查灾之行。同样得益于这次北川查灾的还有11月份写的小说《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这个故事也直接来源于查灾时别人告诉他的材料，小说原名就叫《查灾》。但沙汀站在左翼作家的立场上，对当时四川灾荒下的农村社会作了自己的政治解读，在作品中把那为了两升粮食就轻易杀人的对象安放到一个地主身上，带有明显的左翼社会剖析的色彩。

沙汀的代表作《代理县长》也是采自于北川的查灾见闻，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么一个代理县长，是一个活生生的喜剧人物。他习惯于过“烂帐日子”，大言不惭地对省里来查灾的人员宣称要禁止灾民出境，要“从瘦狗身上炼它三斤油”。他非常自信地留守在荒凉贫困的灾区，脸孔上整天堆着生动丰富的表情，“要哭有哭，要笑有笑。”这个人引起了沙汀极大的兴趣，其身上带有一种“泼皮”劲，集中体现了灾荒贫困之下四川地方统治者的蛮和蠢。这个人洗脸有一种特别的派头，喜欢把脸浸进滚烫的开水里，然后用毛巾反复揉搓着发炎的鼻子，好像在水里搓洗衣服一样。最后还要把毛巾的一角塞到鼻子里不停地转动，像打扫烟筒一样。这个精彩的洗脸细节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安放在了作品中的“代理县长”身上。但引发作者创作动机的是另外一个人，他是北川县政府的一个秘书。“此人头发蓬松，穿一件褪色的长袍，拖起一双布鞋，手提一副猪膘满街去借锅炒。这个人的形象立刻吸引了我，我觉得这位提着猪膘满街喊着借锅的国民党县政府秘书，的确充分而又尖锐地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官吏的流氓气和市侩气。跟着，我就依据我的生活经验分析了这位秘书的历史和身世，这个家伙可能是兵痞子出身，不但不学无术，而且欺骗拐诈无所不为。我就决定拿这个人物作为我小说的主角。”^①作者把秘书

^① 沙汀：《谈谈人物的创造》，《西南文艺》1953年6月号。

身上的流氓气、市侩气都安放到代理县长身上，让人感到既可憎又可笑。如果作者没有亲自感受灾区那些盘剥灾民的苛政，亲耳听到让灾民掏钱买票候赈的丑闻，这个苦寒已极的灾县和令人厌恶的内地父母官的形象就不会那么鲜明地展现在我们眼前。^①

此外，还有好多作家与灾害有着不解之缘。1931年4月到8月，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几乎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惨痛的记忆。从南到北，珠江、闽江、长江、淮河、黄河、松花江、嫩江泛滥，到处是洪水横流、大地陆沉的景象，有23个省出现了灾情，尤其是江淮流域更是遭受了惨重的创伤。大水灾刚刚发生，女作家丁玲就到灾区调查走访灾情，在当年的夏天就写出了标志其风格转向的小说《水》，倍受左翼文坛的推崇。作品直面洪水的肆虐与淫威，刻画了水灾下人们惶恐不安的心理，表现了人与自然抗争的紧张激烈的过程。鲁迅先生对水灾也很关注，对国民政府的一些救灾口号和措施极为反感和不满，杂文《水灾即建国》就批评了国民党所谓的“水灾建国”的谬论，讥讽《建国月刊》上那些“光辉灿烂”的水灾摄影的插图说尽了“建国”的本色。他对青年人创作的水灾木刻也非常关注，曾写信关心郑野夫木刻作品《水灾》的出版；对刘岷的《黄河水灾图》也加以点评，认为其第二幅最好，而第一幅则未能表现出“嚎叫”来。现实的焦虑触发他要去创作一个与水灾有关的作品，他多么希望现实当中能有一个救民于水深火热的英明政府，可观察到的却尽是失望，于是他只好把现实的希冀安放到古人的身上。1935年他创作了小说《理水》，描写了为救滔滔洪水中的灾民而摩顶放踵的大禹的形象，其中就折射了他对现实当中的水灾的观察与思考。《理水》是一幅典型的现实讽喻的漫画，活画了当时国民政府在救灾中漠视民命的丑态，作家把对水灾里中国现实的愤慨与希冀都投射到自己的作品当中了。

作家冰心的创作生活也与灾害有着紧密的关联。冰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闺秀派作家，早在燕京大学时，她就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

在一些赈济灾民的活动中显得非常活跃。1920年北方五省发生大旱，燕京大学为了赈灾，女校和男校共同组织文艺募捐会，冰心把比利时作家梅德林克的剧本《青鸟》从英文译成中文，并在11月27日参加了该剧的演出，筹得募款1200元左右。12月18日是燕大旱灾纪念日，燕大召开救灾大会后，冰心和同学拿着钱罐和几十个纪念章，去到各女校为灾民募捐。为了纪念燕大同学半年来服务北方五省1500万灾黎的工作，燕大出版了《燕大青年会赈灾专刊》一书，冰心还为此书专门写了一篇《发刊词》，对于燕大的赈灾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对自己那次募捐活动作了形象地回忆与记录，“这些可爱的小孩子，蜂蚁似的，把我们都围住了，一片‘给你们钱’的声音，颤动我们的耳鼓，这真是天使的歌声，天国的音乐。我的感想，泉水似的奔涌出来，间不容发之顷，竟没有沉思默味的工夫，只得任它又奔泻了去。”“人类不是应当互助相爱的么？”在这些笔调里流露出的是冰心以后文学作品中对“童心”赞美的萌芽，同时也是她对“爱”的初步的诠释。正是在对灾民的关切与同情之中，冰心有机会随着赈灾的同学走出校园，接触社会，开始了对现实与人生的思考，其作品的视野才不拘囿于狭窄的个人生活，具有开阔的视野，成为当时问题小说的首席作家。在对受灾同胞的关爱之中走向文坛的冰心，其内心深处始终流淌着真挚的爱心，高度典范地践行了文如其人的名言，在日后的文坛上展现了自己的绰约风姿。

二、自然灾害对现代文学整体格局的影响

民国时期频发的自然灾害密切了现代文学与乡土的联系，现代文学开始从五四时期的张扬个性主义转向集体主义描写。现代文学始终高唱着乡土文学的主旋律，都市文学较为衰落，都市文学风景线只是时隐时现地漂浮在乡村的烟霭里。多灾多难的农村生活使得左翼作家更

^① 沙汀创作与北川灾情关系可以参见吴福辉的《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159页。

多地把创作眼光投向乡村,使得表现自然灾害的乡土文学异常发达,这种情形反过来又促进了农村的觉醒与反抗,为中国革命添加了强有力的助燃剂,加速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在灾荒的救济中,不同的政权采取了不同的救济措施,取得了大不相同的救济效果。正是在灾荒的救济中,人民群众一目了然地看清了哪个政权是真心地关心民生疾苦,他们清醒地选择了自己的未来归属,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描绘出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现代文学与乡土中国紧密相连,李欧梵对中国小说的发展轨迹下过一个判断,“中国现代小说的进展清楚地显示了从二十年代早期以城市为背景的自传体裁转变到三十年代以后描写农村范围的乡土文学。”^①因为大多数作家都来自农村,与乡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即使后来定居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也阻断不了他们重返乡村的渴望与冲动,在作品里进行精神的返乡之旅。张天翼曾经说过:“做个作家就尤其需要认识农村,作家是要描写多数人的生活的,替大多数人申诉,而中国的绝大多数就是农民大众,离开了农民,那就什么都成了空的,也可以说不成其为一个中国作家了。”^②周启祥的诗歌《在祖国赤贫的农村里》写出了农村的凄凉景象,可以说是旧中国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形象写照:连年灾荒,苦难与饥馑已经成了中华民族记忆深处的隐痛。“在我底祖国赤贫的农村里/年年都上演着灾荒的悲剧/年轻人脸色铁青、骨瘦如柴/老汉妇孺也奄奄一息待毙”。^③

左翼乡土文学的发达与传播反过来又促进了农村的觉醒与反抗,傅尚普的诗歌《灾后》描写了在日益艰难的生存处境中,灾民开始觉悟了,明白自己所遭受的不幸既有天灾,更有人祸的因素在内。他们开始觉醒,于是团结起来,一致向着大众的公敌死拼,准备向着真理的道路迈进。“他们明白了、觉悟了、认清了/……真理在昭示着奋起;/社会是大家的,没有少数人/没有少数人压迫大家伙的道理。”^④王兆瑞的诗歌《自伙儿的告语》描写了灾荒下的流民被迫流浪他乡,决心团结起来,给旧有的世界来个翻身。“不要浪费你的眼泪,/过往的伤痛会把心追碎;/谁知道我

们的路有多长,/你应该运上全身的力量。/也不要叹说前途的险恶,/辽阔的宇宙下哪里能够驻脚?让我们手扣手、心靠心,/给旧有的世界来个翻身。”^⑤傅尚普的《生命的哀祭》描写月夜郊外遭受灾荒蹂躏的饥民,他们在思考是谁剥夺了他们血汗结晶,不打算做懦弱的饿死鬼,要用自己的热血去开辟生活的真义,“是谁剥夺了你们的血汗结晶,/让你们饿死在苦难的火坑?/你们不也曾叫喊过吗!/可有谁来应你们一声?/……显然,这生活要把你们推入死亡,/往日工作的下贱都成了现在的梦想;/死去吗?不!鲜血永远是热的,/在热血的澎湃里,去开辟你们生活的真义。”^⑥

灾荒如同一块试金石,不同的政权面对人民群众交出了不同的答卷,人民大众也在灾荒中擦亮了眼睛,认清并选择了自己所属的道路,画出了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基本轮廓。李纶的戏剧《难民曲》描写了在1943年的河南灾荒中,国民政府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灾民的不同态度,在鲜明的对比中反映了民心的向背。1943年,河南农村发生了普遍的大灾荒,贫苦的佃农崔老头一家已经断粮三天,孙子狗娃饿得不停地哭叫,儿子崔志发和儿媳到外面去寻找食物,走了十几里地也没结果,到处都是剥树皮挖草根的灾民。在这种情形下,国统区的副官还派崔家交一百斤军草,王保长也来催收地租和卫生捐,逼得他们一家根本没有什么活路。儿媳为了保全崔家一条命根,含泪提出要卖身救家人。无奈之下,他们父子忍痛以三百块钱的价格将其卖给了人贩子。崔志发用卖妻钱买了一小袋糠和一块馍,带着剩下的一百多块钱回家。刚刚到家,副官和王保长就逼上门来。副官拿枪威逼他们,抢走了媳妇的卖身钱和那袋糠。王保长见没有什么可拿就大骂起来,

① 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② 蒋牧良:《记张天翼》,《文艺生活》(海外版)第7期。

③ 周启祥:《在祖国赤贫的农村里》,周启祥主编《三十年代中原诗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96页。

④ 傅尚普:《灾后》,周启祥主编《三十年代中原诗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⑤ 王兆瑞:《自伙儿的告语》,《海星》创刊号。

⑥ 傅尚普:《生命的哀祭》,《大华晨报》副刊《新垦》第2期。

逼着他们以房屋作为抵押，崔家父子只好弃家逃荒。路上遇到的一群难民告诉他们说：“听说在西北方有个什么边区！那个地方政府里照看穷人，有饭吃。”他们就奔西北边区走，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崔志发被抓去当壮丁，崔老头和孙子被边区自卫军搭救送往边区。崔老头被妥善地安置到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农村，受到热情欢迎，乡长、支书和当地的农民都纷纷前来看望他们祖孙二人，还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分了田地，送来农具、衣服和粮食，当地的驻军高班长还带着全班战士来帮助他们开荒。崔志发后来也被八路军解救出来，来到了边区与家人团聚。崔老头感叹道：“想不到俺受了一辈子苦的人，能到了这个天堂的地方。”他们一家人对政府、人民和八路军都非常感谢，高唱着“共产党就是咱中国人民的太阳”。

现实的情形也的确如此，边区政府领导人民战胜了灾荒，粉碎了日伪的经济封锁，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也在救灾中赢得了民心，老百姓把根据地看成是一个“新世界”，灾民纷纷从国统区和敌占区逃往根据地。“灾荒愈发展，三个世界的对照愈清楚，从安阳到玉峡关的封锁线，虽然可以和敌人的封锁沟墙相比拟，但封锁不了饥饿发疯的灾民，沿着美丽的清漳河，褴褛的人群，日以继夜地向根据地内流着，涌着。”^①从这不断奔涌的灾民的流向中我们不难见出民心的向背。从徐特立的诗歌中也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国统区的灾民是衣不蔽体，以秕糠充饥，不死即逃；而一水之隔的陕甘宁边区则是另一番景象，家家都有余粮，边区政府与民众共纾时艰。“蒋阎肆虐政，灾民遍吕梁。/败絮不蔽体，充饥惟秕糠。/老弱转沟壑，少壮半逃亡。/转看警备区，家家有余粮。/黄河一水隔，地狱与天堂。/法币八万万，购棉又购粮。/边区济河东，艰苦与共尝。”^②

国民党作为执政党，面对灾荒不但救灾无力，在文学方面的作为也乏善可陈，倒是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左翼知识分子对农村作了丰富的表现。“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中国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这个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经济危

机的根源，被这些与国民党政府格格不入的文学界的知识分子痛苦地观察到，并生动地表现出来。这样，他们的乡村文学无论是讽刺的，田园牧歌式的，现实主义的，或鼓动性的，事实上几乎都成为对那个极少注意改善人民生活的政权，表示抗议和不满的文学。”^③他们作品中流露出对农村大地的强烈的情感，这是与他们敏锐意识到的社会经济危机密不可分的。这个结论不光适用于30年代，同样为后来的表现农村灾荒的文学所证明，好多作品可以说是反抗的文学，传达出作家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拯救欲望。

自然灾害也影响了现代文学的艺术品格，频发的自然灾害引发了作家的社会批判意识，一些作家为了鼓动与宣传根本无暇顾及作品的艺术性，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受众是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因此许多作品趋于简单直白的暴露与控诉，缺少了一种优美与含蓄，特别是一些思想左倾的作家更是在作品中明确地流露出自己的思想倾向。如沙汀在创作《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时把杀人犯的身份改变为地主，石灵创作《捕蝗者》时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与无耻，丁玲的《水》表现了集团的力量等。洪深对自己创作《农村三部曲》时的思想作了剖析，“我已阅读社会科学的书，而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友人们不断与以教导，我个人的思想，对政治的认识，开始有若干改变。”^④在明确的政治思想指引下，好多作品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主题先行的色彩。戏剧评论家张庚也看到了这一点，指出了洪深《农村三部曲》的不足，“最近数年来，他更花了精力，尽他的可能，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他所理解的江南农村的疾苦，农村中的思想动摇和激变。在他的世界观中，个人的，小有产者的苦闷是不被重视的。每一个题材，每一个题材中所表现的主题，在他，都有

① 《从灾荒中站起来》，《解放日报》1944年8月29日。

② 徐特立：《七十客绥，哀吕梁灾民并自寿》，《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66~167页。

③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6~517页。

④ 洪深：《洪深选集·自序》，《洪深文集》（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493页。

一种必要的价值的衡量：那便是当作一个社会问题、道德问题而提出来；而且在可能范围之内给予解决或者解答。”^①在这些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一些作品成了宣传指导现实生活的手册，这在戏剧方面表露得尤为明显，如反映边区政府指导群众治虫的《神虫》、《捉害虫》等作品简直就是一份时事的宣传单。

同样是以瘟疫为题材，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一些作品比较起来其艺术品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鲁彦的《岔路》、方光焘的《疟疾》、沈从文的《泥涂》等，这些作品只就瘟疫的表面现象作了描写，反映了瘟疫下群众愚昧迷信的心理，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但它们与国外同类题材的现代主义作品比较起来，却没能穿透事物的表象，上升不到一定的哲理高度。比如同样是写鼠疫，法国作家加缪的长篇小说《鼠疫》既描述了人们在鼠疫下与世隔绝的那种恐惧与焦虑，抗议了法西斯的专制与暴虐，同时也表现了人类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葡萄牙的萨拉马戈的长篇小说《失明症漫记》则具有寓言的意义，描写了人们突然患上“白色眼疾”，双目失明，疫情迅速蔓延，人们陷入了极大的恐慌。虽然后来疾病自动消失，但人们日常的道德水准却没能经受住疫情的考验。医生解释不了这种不治而愈的现象，医生的妻子看着复明后欢乐的人群突然感到恐惧，怀疑自己是个看得见的“瞎子”。小说穿越了疾病的表象，已经直抵生活的本质，带有强烈的哲理色彩。

现代文学与自然灾害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互为影响。一方面现代文学因自然灾害而与乡土中国紧密相连，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阶层血脉相连，促进了农民的觉醒与反抗，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另一方面自然灾害也制约了现代文学的多维度发展，使得现代文学囿于乡土而忽略了自身的现代品格。

[导师杨义教授、张中良教授点评]

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对自然灾害与人的关系关注很少，即或有之，亦偏重于自然灾害引发的社会矛盾。其实，现代作家对自然灾害本身及其灾难性后果多有表现。张堂会这篇论文在扎扎实实的资料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自然灾害对现代文学的影响，揭示了自然灾害与作家心态、创作风格以及现代文学整体格局之间的关系，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创新价值，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独特的学术眼光与搜集爬梳资料的科研能力。论文风格质朴厚重，与所论内容谐调一致。

本文作者：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届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① 张庚：《洪深与〈农村三部曲〉》，《光明》第1卷第5期。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 on Modern Literature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Tanghui

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reative mind of the writers and their writing styles. Under the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 the writers paid so much attention to the rural areas that native literature developed abnormally and the city literature became relatively weak, which caused serious imbalance of overall pattern of modern literature. And in turn, Left-wing literature promoted the awakening and resistance in rural areas that pushed forwar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s revolution.

Key words: modern literature; natural disasters; disaster literature